

导言 19 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资料

18 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那些以耶稣会士的报告作为自己观点基础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堪称独步。伏尔泰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他们对据说在中国存在的宗教宽容推崇备致，他们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制品，尤其是陶瓷。所有这些在 18 世纪中叶法国兴起的“中国时尚”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种崇拜在英国也引起了回应和共鸣，但是其热烈的程度却要低得多，而且还夹杂着一些敌视的言论。1719 年，英国出版了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就把中国人描写成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时不列颠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商业上的，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体验到的种种挫折，极大地败坏了中国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1740—1744 年，安森勋爵（Lord An-

son) 作环球航行时访问了广州，他的随行牧师被中国人对来访者施展的诡计、敲诈和欺骗所震惊。

到 18 世纪末，西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欧洲革命，与中国的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章。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列颠急于扩大海外市场，这个需要越来越明显。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据信，她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可是从 1760 年起，在那里的贸易却仅仅限制在南部的广州一处。1792 年，马戛尔尼伯爵 (the Earl of Macartney, 1737—1806) 率领一个使团前往中国，这次使命的主要目的是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希望获准进入中国的其他口岸。这次访问的彻底失败使人相信，中国最终将被迫改变对西方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对中国的主导观点发生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不再引用伏尔泰的赞誉了，而或许会引用广州副主教约翰·格雷牧师 (the Revd John Gray) 的话了。格雷牧师是一个对中国人怀有好感的人，但是他仍这样写道：“他们的宗教是由各种迷信组成的。他们的政府在形式上或许是最易于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专制政体。”

从马戛尔尼使团以后，前往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外交家和旅行家的数目开始增加，他们的作品成为本书的材料来源。他们留下的资料是丰富的。如果将官方记录、报纸和未刊资料也算在内的话，情况更是如此。这本文选并

格雷：《中国人民法律、时尚和习俗史》，伦敦，1878 年版，第一卷，第 16 页。

不打算做全面的介绍，它的重点将落在那些更易于得到的资料上，也就是那些已经出版的英文资料上，近年来重印的书籍将占很大比重。尽管如此，这些材料的数量仍然是非常庞大的。因此，本书使用了如下一些选择摘要的标准。

文选所收集的大部分篇幅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成的，作者们可能在所叙述的事件中起过显而易见的作用，或者在所讨论的事情上学有专长。此外，还给另外一些作者留下了一定篇幅。这些作者对中国人的认识不仅仅是基于对这个民族的知识，而且还基于它的产品。《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 刊载了一篇书评，是关于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 有关《中国刑法》一书的评论，这篇文章这样写道：

旅行家的作品，即使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之处，几乎都带有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感情色彩；而且，在讨论中凡是表现出激情或争论之处，都会使准确性和评价的公正性受到影响，从而无法满足人们求真的愿望。然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

本书的绝大部分篇章选自那些为出版而写作的书籍，但是我们也摘录了一些日记和信件，这些材料提供了更多的关于中国人的私人观点。例如曾经做过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① 《大清律例》，载《爱丁堡评论》1810年第16期，第477页。

留下了他的私人日记，日记中有些曾被他毁掉了。其他人也有日记，如马戛尔尼勋爵，额尔金伯爵（Lord,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James Bruce, 1811—1863）和“常胜军”指挥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等。在信件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马根济牧师（the Revd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88），他曾每隔两周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想通过他的信件向那些未曾到过中国的亲友描述这个国家，这个目的使他的写作范围大大拓宽。

西方的材料可以说既包含了有关中国的叙述，又带有西方对 19 世纪的中国及其人民的态度，这两方面的信息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问题是：本书所选的材料其价值究竟何在？外国评论者可能比当地作家更客观。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能因缺乏相应的训练，成为不可靠的目击者。似乎像是为了回答这种责难，许多作者都力图证明自己的资格。

谁的观点最值得注意？对那些多年居住在中国沿海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时间的长短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许多作者在其作品的前言中都强调这一点。美魏茶牧师（the Revd 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 14 年”，斯卡思（J. R. Scarth）给自己的书题名《在中国的十二年》，科勃尔德牧师（the Revd R. H. Cobbold）自称他在宁波口岸的中国人中间生活了八年，而且“经常有机会在浙江省内旅行”^①，并以此作为自己写作的资格。

科勃尔德：《中国人的画》，伦敦，1860年版，《前言》第 3 页。

特别是那些学过中文的人，往往声称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有资格和能力告诉人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强调为领事机构培训翻译的重要性，指出“在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之外，再加上五年扎实的训练”，对于造就一个“合格的译员”是必要的。在谈到一位投身于有关中国事务的写作而自己又不懂中文的作者时，他表达了下述观点：

……我们看到了一本为出版界注意的新书——《中国印象：当前的革命，其进展及前景》，作者是被起义者占领时赫尔墨斯号的费时本舰长（Captain Fishbouine）。文翰爵士（Sir Danuel John Bonham, 1803—1863）到南京时曾乘坐过这艘船。我们希望在作出结论前看到这本书，但是同时……我们断定它恰巧成为我们的观点的对立面：我们必须将这种可笑的例子告诉翻译家们，这个事例表明一个由于不学习语言而产生的恶果。它告诉人们，一个人试图对仅仅一知半解的事情作最真实报道所产生的谬见和误解，对于一个思想早已定型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要犯的错误。而对这位既不了解那些人民，又不懂他们的语言，闭门造车，写出关于“中国——它的革命、进展和前途”的人来说，情况更糟。在此，我们再一次毫不迟疑地断定，不懂中国语言，就这个例子而言，将无助于纠正这位勇敢的舰长所犯的 error，或以任何方式矫正《观察家》（the Spectator）所谓的“一个追求个人喜好的狂妄之

人无根据的希望和轻率的确信。^①

费时本舰长毕竟在中国工作过，比起其他几个率尔操笔的人来，更有资格写作关于叛乱的进展情况。《中国的革命》的作者麦克法兰（Charles Macfarlane）和《太平王的生活》的作者麦基（J. Milton Mackie）都不能算拥有第一手知识，他们毋宁说是靠自己职业作家的身份来引人瞩目的：在其著作的扉页上他们还特意标出自己是《日本》和《惠灵顿的一生》（A. W. Wellington, 1769—1852, 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将军——译者注）、《西班牙的事情》（Cosas de Espana）和《沙米尔的一生》（Schamyl, 一作 Schamnyl, 1797—1871, 高加索穆斯林抗俄领袖——译者注）的作者。他们的著作不过是“剪刀加浆糊”，但因为保留了一些早期的译文，因而仍然有些价值。

然而，与费时本舰长相比，另一些西方人的确显得更加有资格。阿礼国在担任驻日本总领事之前，曾在驻中国许多地方的领事机构中工作长达 12 年之久。1865 年，他作为英国大使重返中国。在亚洲工作 27 年后退休。更著名的例子是老中国通巴夏礼（Harry Parks 1828—1885），他以译员身份开始他的外交生涯，成为《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 1814—1865）所说的那批“20 年

阿礼国：《中华帝国及其命运》，载《孟买评论季刊》1855 年 10 月第 4 期，第 229 页。

在中国讲华语的人^①中的一员。

关于中国的一个真正专家是英国翻译密迪乐 (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 ,他从 1841 年起在皇家慕尼黑大学开始学习中文, 1843 年在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四年后, 出版了第一部著作: 《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在这本书中, 他这样谈到自己对中国和中文了解的程度:

读者可能会对有关下列杂录中的陈述和观点的可信程度产生某种评价, 我愿在此表明, 在何种情况下我有什么理由感到我有资格来写作有关中国的事情。

我认为我自己有权利去写中国, 首先是因为我对中国的语言有某种切实的了解; 其次, 因为近五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事务中去; 其三, 因为在其中将近三年的时间里, 我一直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有利位置, 以获取有关那些特殊题目的知识, 这些知识正是我努力去写的。^②

密迪乐是一位具有好斗气质的人, 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国人及其叛乱》中, 他用一章的篇幅来评论法国传教士古伯察 (Evariste - Regis Huc. 1813—1860) 的《中华帝

柯克: 《中国: 作为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报道, 1857—1858》, 伦敦, 1858 年版, 第 392 页。

^② 密迪乐: 《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 伦敦 1847 年版, 《序》第 7 页。

国》(L'Empire Chinois) 一书。他承认古伯察对中文有一定了解,而且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特别是在禁止进入内地的年代,他的这些考察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又批评这位传教士在书中犯了或重犯了许多错误。密迪乐认为,其原因在于古伯察不加批判地引用那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们的作品,还从中国基督徒那里获取资料,这些皈依者因为宗教的原因把自己与其他中国人隔离开来。即使古伯察记载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也总是免不了夸大其辞,夸张地宣称自己与中国上层社会有如何频繁的接触。古伯察还暗示人们,因为他对中国内地有很多了解,因而他的观点特别有价值。密迪乐没有离开过沿海到内地旅行,却试图贬低古伯察的“内地知识”,他强调自己作为居住在通商口岸的翻译,有与中国人交往的广泛的机会。^①

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最有份量的评价往往由官员和传教士们垄断,但是其他人的观点也还有存在的余地。斯卡思(J.R.Scarth)在《在中国的十二年》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为这种倾向作了独特的评论:

绝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书籍出自有官方身份的人——如传教士们和那些与当地入并无多少接触的人——之手:官员们整日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只能时常作些乏味僵硬的外交式的访问。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从那些从属于中国官员的人那里得来的。传教士的机会要多一些,他们与人民的交

^① 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1856年版,第51—73页。

往要多，而且他们的群众与统治者们没有多少联系，但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所能见到的中国人又与绝大多数其他观察者的角度不同。^①

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他就宣称在谈论中国人的“欺诈”和“卑鄙的忘恩负义”的性格上，传教士具有优先的发言权。他指出，使节们和商人们不如传教士更能摸清中国人的道德品格。

随着特派记者和旅行家的蜂拥而至，以活动范围的广度而不是体验的深度表明程度显得更为重要。第一个到中国的《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柯克被誉为有影响的观点的创造者，因而有勇气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进行怀疑。然而，特派记者们也必须不断为自己的权威提供可靠的根据。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在《转变中的中国》一书的序言中拼命向他的读者证明，由于他的各种丰富的经历，他的观点值得重视：

我在缅甸工作多年，先是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副专员；我曾两次访问暹罗（泰国），最后一次被选入政府使团；我长期住在中国，作为一名探险者，《泰晤士报》特约记者，近来，又与有关铁路的重要谈判有了联系。以上这些就是我在远东的资历。但我的经历又不限于东亚，作

斯卡思：《在中国的十二年》，爱丁堡，1860年版，第1—2页。

为马绍纳兰（Mashonaland，津巴布韦属地）的第一行政长官，我在那里从事过殖民开发工作，也曾为了一个特殊使命去检查尼加拉瓜运河计划，还访问过美国和加拿大，我可以宣布……我已经使自己有资格对发生在远东的事件作出判断，因为作为一个关于远东问题的作家，也应该对西方有研究。^①

旅行家们也在争取读者，他们也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因而也可以进行比较，其中典型的是菲尔德（Henry M. Field）的《从埃及到日本》。这本书记录了一年的世界旅行生活，其中有一章写中国。这本书 1877 年出版，到 1890 年，竟再版 16 次！

决定作者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亲身经历的程
度。1842 年（南京条约）订立之前，外国人在中国活动极受限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那些到过中国其他地方的西方人是偷偷摸摸进行的。1842 年以后，外国人有权从五口（即《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个口岸：它们是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译者注）出发，作半天旅行，但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五口住地。1848 年，斯卡思无视这条规定，乔装打扮后从上海出发：

我的目的是去看看这个国家，而且不受干扰地去做，并尽可能是进入丝绸产地。我换上中国服装，打扮成一个中国人的模样，请理发匠剃光我的头发，在我的帽子上系

柯乐洪：《转变中的中国》，伦敦，1898 年版，《序言》第 6—7 页。

一条辫子，这辫子是从一个汉人的儿子那弄来的，用一付茶色眼镜遮住我这个夷人的带有自然色彩的眼睛，于是便无所顾忌，不怕被人发现，然后才出发。^①

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斯卡思发现即使可以到内地旅行，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到来的反应也是混杂着好奇和敌意，这使得他们与具体的个人进行联系异常困难，他还发现“一本写生画夹是在中国旅行的最好的武器”，因为有了它就可向人表示一个人到处转悠的理由，也使人的心情不致紧张，特别是它能使接近妇女和儿童更为容易。密迪乐身高六英尺一英寸（即 1.80 米以上），一出去就被认出是外国人，于是他便弄了一艘猎鸭船，使自己能沿着大运河旅行，并与太平军发生接触。19 世纪后期，虽然外国人有权利在内地旅行，但他们仍然使用中国服饰，库柏（T.T.Cooper）“戴着假发辫，身穿长袍子”溯长江而上，以避免遇到敌意而发生意外事件。柯乐洪 1882 年在华南旅行时就是穿着全套中国服装，以避开好奇的中国人。

如上所述，外国观察者的客观性可以使他们的描写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客观性是一个珍稀的品格，绝大多数作者却另有企图，其中有些人公开地承认这一点。舍尔（Henry Charles Sirr）在所著《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中声称他写作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反对选择香港作为英国的岛屿基地，由于缺乏先见，他以“香港——肮脏而无价值之地”作为第一章的题目。唛喇（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

斯卡思：《在中国的十二年》第 5 页。

1840—1873) 同样也是易于感情用事的人。他在那本有关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书的前言中声明：“在写作本书时，驱使我的动力是对一群可敬的、被压迫的和被屈辱的人们的同情；此外，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反对英格兰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弱小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所奉行的邪恶的外交政策。”^①

或许是由于一些西方人意识到他们正在观察的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存在下去多久，因而他们才不得不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经历。第六十七团的医生蓝普瑞 (Dr. Lamprey) 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864 年，在苏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看到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个中国士兵的头颅，这个士兵因为拦路抢劫而刚刚被斩首，当时，这颗头颅的肌肉还在抽搐，长达十分钟之久，对此，医师用文字和图示作了详细的记录。^② 同样的心态促使密迪乐亲眼目睹了一个人被凌迟处死 (即 劓 刑——译者注)。菲尔德 (Henry M. Field) 也观察了中国人使用刑罚的过程。

随着照相机的出现，以更准确的方法再现中国成为可能。亚罗战争 (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 就是第一批用照相术向人们展现的重大事件之一。从 1868 年到 1872 年间，约翰·汤普森 (John Thompson) 在《中国及其人民画册》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中使用了照片。这在有关社会的文献汇编中开辟了新天地。但是在

① 唻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伦敦，1866 年版，第 7—8 页。

② 蓝普瑞：《中国军队的经济》，载《皇家协合军事学院学报》第 11 卷，1867 年第 46 期，第 420—421 页。草图的复件见图版 23。

19世纪底以前，尽管优质照片可以拍摄制作出来，但照相术仍是个缓慢而且麻烦的记录方式。照相底片的生产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普遍使用，像1883年出版的柯乐洪的《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仍然使用照片的木刻版来作插页。将近19世纪末，观察家们仍然依靠文字和绘制插图来记录他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事件。

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大部分记载仅仅涉及到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甚至到1871年，库柏仍然这样写到：“内地那些巨大的省份还很少有人问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状况仅仅被肤浅地观察。”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时遇到的人们还没有被通商口岸流行的排外情绪所影响。这些见闻经常提供极为不同的印象。让我们再引一段库柏的话：

一个英国人，和别人同样生活的英国人，可能会冒失地告诉他的同胞：要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农民，就要去喜欢他们。他们是仁慈的，令人尊敬的，也是易于冲动的；他们很容易被感动而生友谊，就像我们认为他们易于激动起来，爆发野蛮的狂怒一样。他们的缺点往往使人怜悯而非愤怒。我总这样认为，现在中国人对待外来者的最野蛮的方式也不见得比不久前我们国度里对外国人和陌生人的方式更糟。^①

库柏：《头戴发辫身着马褂的商业先驱游记》，伦敦，1871年版，第2—3页。

随着西方观察范围的扩展，更善于观察的作者们发现了一个一直很明显的问题：对中国人的以偏概全的倾向。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著作都陷入了毫无根据的以偏概全的错误之中。从局部看整体在许多事情上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中国领土的某一具体地点，人们却无法确定有关他们的什么应该是这个帝国另一地区的习俗的特点，或者应是另一省里某些个人的习惯。^①

赫德说，当使用“中国人”这一词时，“我所谓中国其实是站在宁波的角度说的。”我们在同时代其他一些著作中可以见到相似的定义。

卢公明牧师（The Revd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的《华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一书有个副标题：“以福州为主的资料”。而克陞存牧师（the Revd 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 1819—1862）在其《花国的蒙昧——华北的宗教观和民众的迷信》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尽管他所说的许多事情可以适用于整个国家，“但是还是有很多只适用于宁波、上海一带”。

讨论西方文献的价值又引出另外许多争议，这些争议是不可能在一篇短短的导言中解决的。

赫德：《进入中国机构》，伦敦，1986年版，第143页。

第一章 马戛尔尼使团： 条约前的中国

19 世纪初，西方与中国的接触仅限于广州。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以及很少的几个坚韧不拔的传教士和探险者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到过中国内地旅行。随着贸易的增长，广州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使人厌烦，私人贸易商们开始向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发起挑战。当时最重要的商品是茶叶。1784 年，当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指小皮特，1759—1806，曾被称作英格兰最伟大的首相——译者注）把进口茶叶税从高于 100% 降低到 12.5% 时，茶叶的消费量猛增，要求中国进口英国商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人们普遍意识到，要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就应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种认识导致了 1792 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出现。

马戛尔尼到达了北京，并越过长城来到热河的避暑之都，然后又沿着大运河和其他河道返回广州，总共花了 7 个月时间。随行的专家涉及几个领域，包括医药和植物学，还有一位汉语译员。这次出使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西方派往中国的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这次使命的记录提供了有关当时中国的详细资料。

马戛尔尼对他所接触的中国官员的态度是敏锐的，尽管他决定——或许是错误地决定——对中国方面把他的使团当作贡使对待听之任之。但总的来说，他发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事物值得崇拜。他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受到中国皇帝（即乾隆皇帝——译者注）的接见。虽然他没有行叩头礼（在中国皇宫晋见时必须行的三跪九叩的礼节），但还是受到了皇帝的体面的欢迎。关于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有全面的记录。巴罗（Sir John Barrow, 1764—1848）是使团的成员之一，他的观点则不如马戛尔尼的友好。随团医生吉兰（Dr. Gillan）则受到皇帝的宠臣、那位臭名昭著的大学士和珅的求教，这位医生记下了他对中医的看法，并断言西方的诊断方法的价值要胜过中国的切脉诊断以及对针灸的信赖。

马戛尔尼使团预期的目标一条也没有实现，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仍仅限于广州。但是，使团的记录却成为未来对中国评价的起点。1816 年，由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Amherst, 1773—1857）率领的另一个使团被派往中国。由于他同样拒绝行叩拜礼，所以没有得到皇帝（此时为嘉庆帝——译者注）的接见。这次使命的失败大概可以从使团第三号人物埃利斯（Sir Henry Ellis, 1777—1855）

对中国的幻想的破灭情绪中体会到。

19 世纪初，在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家中，没有比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更大的权威了。他曾随同阿美士德勋爵到过北京，他学过中文，出版过有关中国诗歌和戏剧的译作。在《中国人》这本书中，他试图继一百年前杜赫德（du Halde）编纂《描写》（Description）一书那样，第一次有条理地编辑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该书的主基调对中国人是友好的，比起鸦片战争后他出版的《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一书明显的更为友善。

虽然广州贸易的挫折为鸦片战争的到来起了加速作用，但回忆起来，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这些条约以前的日子对在在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却是黄金时代，至少对美国商人亨特（W. C. Hunter）来说是如此。然而在绝大多数欧洲商人用混合语（洋泾滨英语）作生意时，亨特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学习了中文，然后从 1829 年到 1842 年在广州为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工作。在 40 年后出版的一部书中，他描写了“番鬼”（外国魔鬼）在广州的生活。他记录了中国政府为外国人提供的安全保护，并且详细叙述了行商们的遗闻轶事。行商是中国方面享有一定外贸垄断特权的人物。他特别讲述了最富有的行商浩官（Houqua，伍秉鉴，译者注）的故事。英国医师唐宁（C. Toogood Downing）也对这段历史持肯定的意见，他希望让那些“厚道”的读者们认识这个民族的亲密的老熟人，“这种亲密是我们非常有限的交往现在将要承认的”。但是他对中国海关监督